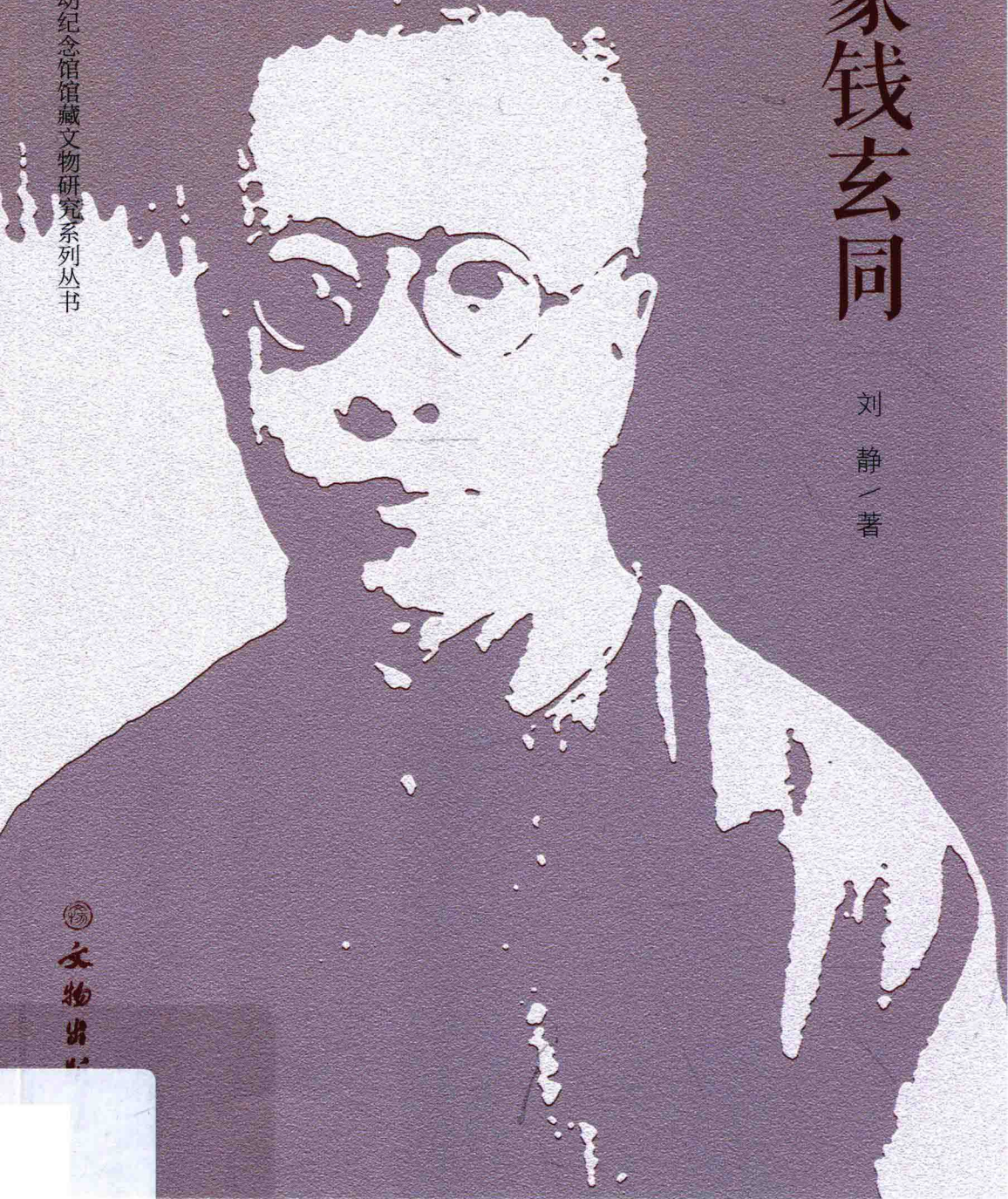


印象钱玄同

刘静 / 著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藏文物研究系列丛书

文物出版社



印象钱玄同

刘静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象钱玄同 / 刘静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010 - 5109 - 0

I. ①印… II. ①刘… III. ①钱玄同 (1887 - 1939)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8829 号

印象钱玄同

著 者: 刘 静

责任编辑: 孙 霞

封面设计: 程星涛

责任印制: 张道奇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1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5109 - 0

定 价: 36.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印章存印象 名字以明志

钱玄同（1887～1939）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文字音韵学家，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改革激进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之一。

钱玄同祖籍浙江湖州，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廿五日（1887年9月12日）申时，出生在江苏苏州，是父亲钱振常（1825～1898）的老来子，他出生的时候，老父亲已经62岁了。生母周氏是钱振常的侧室，长兄钱恂（1854～1927）是父亲原配姚氏所生，年长钱玄同34岁，钱恂的长子钱稻孙与钱玄同同岁。

1890年，虚岁4岁的钱玄同由老父亲亲自启蒙，每天站在书架前读他父亲亲自书写贴在书架上的一条一条的《尔雅》词义。年幼的钱玄同常因站立时间太久而两腿僵直，需让人抱回去休息。6岁进入家塾学习，11岁那年钱振常去世，长兄钱恂继续为他延请教师，令其在家塾读书。1906年5月，由钱恂做主，钱玄同与浙江绍兴徐尔谷长女徐娟贞结婚，同年9月，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1910年，钱玄同从日本归国，先至浙江嘉兴中学教文字学，后又在海宁中学堂讲授文字学，兼及《左传》。1913年8月，钱玄同被任职北京大总统府顾问的兄长由杭州召至北京。9月，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不久，兼任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钱玄同立即在《新青年》2卷6号发表《通信》表示声援，提出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作为文学革命批判的对象，此后又发表《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文章，提出新式标点符号、书写方式左行横迤、纪年当用公元纪年等主张，身体力行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钱玄同“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文章汪洋恣肆，态度激烈，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是极大的打击。正因为钱玄同

态度激进，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反对者们“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竭力来咒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①除了在新文化运动中迎风破浪，摧毁旧思想、旧文化，钱玄同在汉字改革、国语运动中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他的建树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十年，合计12220字）。第二，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第三，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二千三百余字）。第四，提倡世界语。第五，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此外，他执教近三十年，开设过“古音考据沿革”、“中国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魏建功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②而钱玄同的“疑古”思想以及他对顾颉刚“辨伪”研究上的支持，促成了“古史辨”派的诞生。

钱玄同原名师黄，字德潜，赴日本留学时曾用名钱怡。辛亥革命前，改号汉一，又由汉一改名为夏，字中季，亦称季、季子。1916年9月改名玄同。五四运动后，又号疑古，后又称疑古玄同。一生之中别号众多，从“疑古”二字衍生出来的字号就有逸谷、夷罟、忆菰、怡谷等等，此外还有饼斋、掇猷、仁佗、彦均、龟竞、羲鹄、鲍山病叟等等诸多名号。

“钱玄同”一名因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海内咸知，家人却仍旧称他的旧字“德潜”，如侄子钱稻孙便一直称他为“德叔”。钱玄同的好友周作人对他的称呼也因时因事而异，从1918年至1935年周作人致钱玄同百余封信函中可见，他对钱玄同的称谓有：浑然仁善的阿哥、浑然、狂泉主人、心异、形而上一样、元同、逸谷、非白不异等等，周作人自己的落款也各有不同，这种文人之间称呼上的文字游戏，浓缩了老友间的默契和认同，周作人对人的字号也有自己的认识：“地名如山川乡村街坊的名号，说起典故来还有点意思，人的名字和姓差不多都是无聊的，何况又是随便取的什么别号呢。庵堂斋馆大都是顺手拉来，暂时使用，有如出门走路穿上一双布草鞋，走过几程又复

^① 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② 陈漱渝：《序二·钱玄同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换了，不会得收拾在藤箱中背了走以作纪念的。”^①

钱玄同是民国时期一位小学大家，幼承庭训，学习《尔雅》《说文》，在日本时更是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文字学造诣极深，他给自己取的名、字、号都是极有寓意的，他在日记中就提到：“小学最好用‘名’字括之。”钱玄同在不同的时期使用不同的名、字、号，有的名号体现钱玄同对文字学、音韵学的爱好，如与“疑古”音近而字异的“逸谷”、“夷罟”、“忆菰”等；也有体现其在今古文经学领域的追求的名字，如“饼斋”；或对于历史学的再思考如“疑古”二字，或体现对“国语元祖”刘歆庭的推崇如“掇献”一名；更有反对日寇入侵，誓不委敌的“钱夏”之名。这些名、字、号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钱玄同的学术内涵，也是表述其精神主旨的符号，即名字以明志，后人从这些名、字上不难领悟出钱玄同的学术精神和价值取向。1933年以后，外因日寇入侵华夏，内因身体患病卧床不起，钱玄同困居京城，一腔愁绪无从发泄，只得把自己的名号变来变去，同时在与友人的信函和自己的日记中不断说明这些字号的内在含义，以表明自己的志向，以其晚年撰写的一篇日记为例：

下午在孔德检嵇叔夜之《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云：“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李善注：

并，谓兼善天下也；

介，谓自得无闷也。

嵇书下文云：

达能兼善而不渝（案，此并也），

穷则自得而无闷（案，此介也）。

此语本出于《孟子》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素佩白香山《与元九书》：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师。谓之讽喻诗，兼济之义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他是文学家，故所言如此。我兼济事业在“语言文字”，而独善事业

^① 周作人：《关于别号》，《饭后随笔·周作人自选精品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8页。

亦即在此。盖掬（抽）绎语言文字之变迁历史，及考古音、古字、古义之真相，是我所以自娱也；用以斟酌取舍，使适用于今世，是我所以兼善天下也，我能兼济之事惟此而已。故今后拟自称曰：“并介子”，于是“独头”“仁佗”等号均可取消矣！于是我定今后所用之名号：

名：夏

字：季

号：玄同、疑古、饼斋、彦均

别号：急就廌、并介子

与妻共有者：恒恍庐（此四年来挂在太太卧室之门楣者也）。

而“饼斋”亦可写为“并齐”，并，仁也；齐，恕也，若“疑古”又作“義鹄”，则义也。义、恕、仁三者备矣。（义，用崔叟说外，尚兼用墨子说，则尽我所能而为之义也，与“并”义亦相关）（我尽我能之谓）。

“仁佗”一名虽出《急就》，而字画不甚好，远不逮“并”也（初意我名仁佗，娣贞名伯徐，取《急就篇》中两人名用之，她既不用伯徐，我亦不必用仁佗矣；钱伯徐虽仿曹惠班、阴女荀之例，究嫌不平等，虽然她是愿称钱太太）。①

钱玄同以小学作为自己独善和兼济的事业，既是自己兴趣所致，也是其实现简化及规范汉语语言文字，达到普及教育、开启民智的宏愿。一个“并介子”的别号，涵盖如此之丰富，如果不是钱玄同在日记里娓娓道来，后人又怎能从这三个字中领会其中深意。

钱玄同将自己常用的名号分别请名家篆刻成图章，在自己的文书、藏书、日记、写给亲友的信件上留下印记，这些图章有在琉璃厂请篆刻名家所刻，也有托请好友、学生所刻，钱玄同也会在日记和致亲友的信函中详述刻印的经过和所刻字号的来源和内涵，使得这一枚枚印章背后都有不少值得挖掘的故事。这些印章篆刻的细节在日记中常有记载，如1934年8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至同古堂刻牙章，名号各一，装入皮盒，文曰：钱玄同印，仿汉印白文，钱疑

① 杨天石：《钱玄同日记》（整理本）1937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古，细朱文，小篆，以便带在身边随时可取用也。牙章二，二元二角，加皮盒，八角，共三元。刻字，每字七角，四元九角也。共七元九角也。”

钱玄同对自己的印章都十分喜爱，时常把玩。1937年11月的一天，钱玄同在晚餐后整理自己所有的印章，共计52枚，其中包括一个“子母印”和一个“两面印”，合起来算是50枚印章，他精心将印章分类，制成印谱，从晚上20点一直印到22点，印得手甚累，头甚胀而睡。^①钱玄同还专门到琉璃厂为自己的印章制作封套，同时还精制了三个楠木盒子用来存放这些印章。

2003年，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从钱玄同先生家属处征集到其遗物3000余件，包括书信、手稿、印章、书籍、家俱等，其中钱玄同珍藏的印章85枚，除去钱玄同岳父徐尔谷等人的印章及花押一枚，钱玄同自己名号的印章共计49枚，其中饼斋4枚，病叟1枚，苟尻1枚，觚庵居士1枚，龟竞1枚，急就顾1枚，急就膏3枚，季子1枚，钱季2枚，钱季夏1枚，钱夏5枚，钱夏玄同1枚，钱玄同4枚，泉玄同3枚，玄同3枚，玄同氏1枚，钱疑古1枚，钱怡1枚，彦均1枚，夷罟2枚，



怡谷老人1枚，疑古5枚，疑古玄同2枚，忆菰翁1枚，肆觚1枚，季中1枚。篆刻者也多为名家，如齐白石、马衡、魏建功、王青芳、张樾丞、张少丞等。材质有石制、铜制、象牙制、木制，大小不一，风格迥异。虽然从已知的印蜕来看，有不少印章并未入藏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如魏建功为老师钱玄同所刻的注音字母字样的印章等。这些小小的印章即有钱玄同的名，又是钱玄同的遗物，再结合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藏钱玄同遗物，让我们对这位新文化运动猛将、小学大家有更为明朗的印象。

① 杨天石：《钱玄同日记》（整理本）1937年11月13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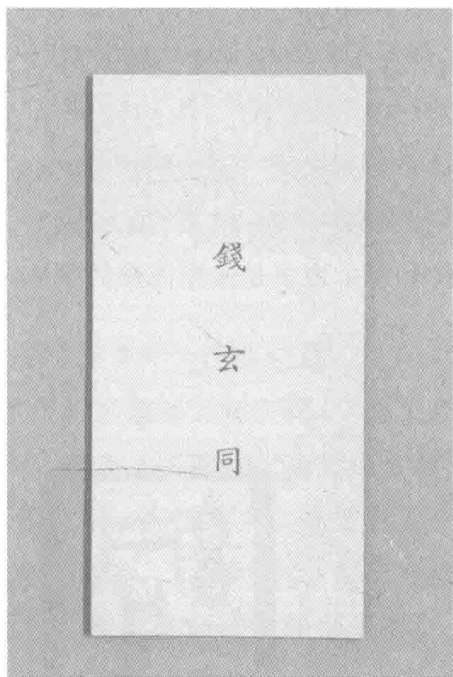
目 录

印章存印象 名字以明志	1
一、钱玄同	1
二、师黄	25
三、疑古	31
四、“疑古玄同”	45
五、钱夏	55
六、钱季	66
七、钱怡	72
八、饼斋	78
九、掇猷	87
十、病叟	94

十一、急就高	102
十二、龟竞	120
十三、彦均	133
十四、义鹄	142
十五、泉玄同·衡	148
十六、徐尔谷学	158

一、钱玄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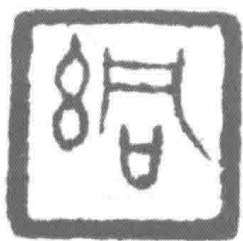
本名为“师黄”、字“德潜”的钱玄同，是1916年9月12日（即他虚岁30岁生日）以后自己改名为“玄同”的，古人说“三十而立”，“玄同”这个字也有“立志”之意。之前他早已自己改名“夏”、字“季”“中季”，因此，“钱玄同”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第一次给自己改名字，1917年，他将名与字都改成“玄同”。“钱玄同”这个名字的正式启用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新青年》上不断发表鼓吹新文化，新思想，攻击旧文学，旧伦理的文字，言辞激烈，态度鲜明，为陈独秀、胡适等人推动的白话文运动摇旗呐喊，钱玄同这个名字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为当时社会及后世学人们所熟知。自1916年改名玄同，至1939年去世，“钱玄同”就是他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名字，因此这个名字的印章也是最多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现存的就有11枚，包括“钱玄同”、“泉玄同”、“玄同之玺”、“玄同氏”等，分别由齐白石、马衡、张樾丞、张少丞等名家篆刻。



按“玄同”二字，《老子》曰：“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苏辙解：“默然不言，而与道同矣。”“玄”字在许慎《说文解字》中释为：“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古文“玄”为象形字，下端像单绞的丝，上端是丝绞上的系带，表示作

染丝用的丝结。“玄”亦指玄学，也就是心理学的分支，所以玄通心。周作人对钱玄同的称谓就有“形而上一样”、“非白不异”、“元全”等等。

北大同人马衡为钱玄同篆刻的一枚方形“玄同”阳文印章，“玄同”两字为朱文篆体，“玄”为绞丝形，“同”为𠂔形，边款一面为“甲骨刻辞及葬器款识中之同字皆作𠂔或斜曳右画作凡，窃以为此乃凡字，散盘新郑虎符凡”，另一面为“字正如此作同字，盖从口凡声，许君入之冂部误矣，偶与玄同言此事，玄同欣然属作此印，马衡”。“同”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为：“合会也，从冂从口。”金石学家马衡根据甲骨刻辞和葬器款识中所见，认为“同”字从“凡”，不从“冂”，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同”字的解释不正确，而与精通《说文解字》的钱玄同申明自己的观点，钱玄同赞同马衡的观点，并请马衡为他篆刻这枚印章，后来马衡为钱玄同所篆刻的含有“同”字的印章，也多是采用同样的字体。



为什么要改名“玄同”？钱玄同在日记里记述了其改名的缘故：“一年以来，改变宗旨，思为教育事业略效微劳，又因厌恶阶级社会之故，无一日不受刺激，因之献身社会之心日甚一日。改名玄同，即因妄希墨子之故。”^① 墨子是战国诸子之一，其学说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显学”，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

^① 杨天石：《钱玄同日记》（整理本）1917年4月14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墨子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钱玄同并不全盘接受墨家理论，但是“兼爱”和“尚同”是他所信服的，他说：“吾谓苟不毁家，人世快乐必不能遂，若谓毁家之后即视父母兄弟如路人，则尤为谬见，破坏家族正是兼爱之故，方欲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乌得是谬说耶？”^①



钱玄同所受的刺激，正是1915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1917年的张勋复辟活动这一系列的事件，世事动荡，军阀欺凌，使得钱玄同对大同之世极为向往，希望乱世之后能够万物玄同，“我主张和平者，然以为改革之际，恐怖时代决不能免。夫武力解决，无论如何文明，必谓石虽尽焚，而玉一无波及，此实必不可能之事。况强凌弱，众暴寡，此等世界，无论如何温和稳健之人，亦必不免发指眦裂，一旦反抗，复仇之思想，讵能尽免。吾谓恐怖时代不足惧，但令经一度恐怖即能进斯世于极乐，万物玄同，相忘于道，即是无上上幸福矣”！^② 钱玄同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是有其时代背景的，他在提倡世界语的文章中说：“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与外界的接触日渐增多，钱玄同也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都有一定的认识，也十分倾慕，认为其距离中国所谓“大同世界”已相当接近，反观当时落后的中国，钱玄同们忧心如焚，迫切希望中国能够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与全世界人民一起走向大同。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掀

① 杨天石：《钱玄同日记》（整理本）1916年10月4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② 杨天石：《钱玄同日记》（整理本）1917年1月5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 年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胡适在《新青年》2 卷 5 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激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潮，钱玄同此时将名与字都改为玄同，表达了对新文化新思想的赞同，亦从此对旧文学旧思想进行更猛烈的抨击。钱玄同最早在《新青年》上发表其言论是在 2 卷 6 号致陈独秀的关于称赞文艺改良和附论中国文学分期的通信，就是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热烈回应：“顷见 5 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此后一年几乎每期都有钱玄同致陈独秀或者胡适的通信，主要就文学革命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直到 1920 年陈独秀又把《新青年》迁回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北京《新青年》编辑同人发生分裂，钱玄同离开《新青年》。可以说，五四前后钱玄同的新文化主张基本都是在《新青年》上发表。

从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内容来看，主要涉及文学革命、提倡 Esperanto（世界语）、汉字改革、批判封建伦理和反孔教等。其中有响应《新青年》的号召，也有其率先提出的革命性的激进观点，在当时社会引起极大关注，钱玄同也成为《新青年》的一杆铁笔。

作为文学革命最早的响应者之一，钱玄同主张写文章不用典，采用白话文，主张行文要左行横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学作品提倡现实主义风格，应用文改革提倡数目用阿拉伯数字、纪年用世界通用的耶稣纪年等。这些主张现在看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但在当时却算得上创举了。

写文章不用典故，这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到的一点是相同的，钱玄同认为“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① 如果是有文才的人写文章就一定会老老实实说话，用白描体，如果没有文才，那就不要做，尤其是应用文，就应该写的连老太太都能看懂才行，决不能妄用典故。而且钱玄同还主张文章要有“思想”和“情感”，才是好文章。^② 因为文章是思想的载体，写什么样的文章就是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因

① 钱玄同致陈独秀、胡适的信，见《新青年》3 卷 1 号，1917 年 3 月 1 日。

② 钱玄同致胡适的信，见《新青年》3 卷 6 号，1917 年 8 月 1 日。

此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为思想革命服务的，要推翻旧的思想、伦理，就要提倡新的文学。他认为：“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①

钱玄同对文学革命的鼎力支持，《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极受鼓舞，认为“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② 钱玄同以其深厚的文字音韵学功底，为言文一致，提倡白话文提供了理论依据，“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同的。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像那表年高的意义和话，这边叫做 lau，就造个‘老’字；那边叫做 Khau，便又造个‘考’字。同是一个意义，声音小小不同，便造了两个字，可见语言和文字必定一致。因为那边既叫做 Khau，假如仍写‘老’字，便显不出他的音读和 lau 不同，所以必须别造‘考’字。照这样看来，岂不是嘴里说的声音，和手下写的记号，不能有丝毫不同。若是嘴里声音变了，那就手下记号也必须跟着他变的。所以我说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至于文言和白话的变迁，更有可以证明的：像那‘父’‘母’两个字，音变为 Pa、ma，就别造‘爸’、‘妈’两个字；‘矣’字音变为 li，就别造‘哩’字……照这样看来，中华的字形，无论虚字实字，都跟着字音转变，便该永远是‘言文一致’到了”。^③ 只是因为人为的原因（独夫民贼及文妖等），使得言文不一致，因此才需要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使得言文一致。

钱玄同对于《新青年》的进步也是一个促进者；他给陈独秀写信，提议《新青年》从4卷1号起改用左行横式，且用西式的标点符号，因为“《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因此，《新青年》

① 钱玄同：《〈尝试集〉序》，《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15日。

② 陈独秀答钱玄同的信，《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

③ 钱玄同：《〈尝试集〉序》，《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15日。

从4卷1号起就使用新式的标点符号了。虽然因为印刷问题没有改成左行横迤，但是，“这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新式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以为怪物”。^① 其实钱玄同在1917年1月就身体力行，开始将自己编写的授课讲义改成左行横迤，采用新式标点了，他在1月6日的日记里记述了：“黄昏取上学期大学文科一年级《字音学》讲义，改书横行，注语用小字志于每页下端，本文小注均用（一）、（二）、（三）、（四）为标识，缘文字排列之法横便于直，自是定理（今算学、理化学已多改用横行），我既明此理，便当实行改革。二年级讲义过多，不便全行改写，一年级只教过一学期，不过二三十叶，拟自此学期起，新编者悉改横行，其上学期之旧者，当以暇日由我自己重行写印，改从横式，以期前后一律。”^② 紧接着他就在《新青年》3卷3号的致陈独秀的通信中就陈述了左行横迤的好处：“或曰，高等书籍写原文，固为便利。然中文直下，西文横迤，若一行之中有二三西文，譬如有句曰：‘十九世纪初年，France有Napoleon其人。’如此一句，写时，须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搬到四次之多，未免又生一种不便利，则当以何法济之？曰，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我极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既用横写，则直过来横过去之病可以免矣。”^③ 为了促进左行横迤的施行，钱玄同再接再厉，在1917年8月1日刊行的《新青年》3卷6号上又发表了《〈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一文，开篇明义的说：“独秀先生！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同时“改用横式以后，符号和句读，固然全改西式”。甚至钱玄同认为《新青年》“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新青年》里的文

①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第170页。

②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6日。

③ 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

章，“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而且他还表示：“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同时还请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为《新青年》撰文的各先生都试着用白话文来写文章，“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① 陈独秀回复钱玄同的信中，对其的提议“十分赞成”。

钱玄同对于新文化运动，“却更有特别的功劳”，“因为他是“古文经学”大家章太炎先生的高足。章太炎先生则直把孔子当作一个“史学家”看待，顶多再带了些“教育家”的臭味。钱先生在这点上，受他老师的影响最深，所以到了民七，就一拳打翻“孔家店”，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包办式买卖式的婚姻”，反对雇一群叫花子扛着肃静回避的牌匾送葬，如此等等，也说不尽，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启蒙运动。^② 而且，出于对旧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极度痛恨，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孔最为激进，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③

钱玄同被人称为文化激进主义者主要还是因为他提出的“废除汉文”和“全盘西化”的主张，表现出叛离传统和模仿西方的激进趋向。在《新青年》的通信栏中，钱玄同屡次就废除复杂的汉文，提倡简单易学的 Esperanto（世界语）的问题做出解答，他认为：“近来之贱丈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之古义——如译 Republic 为‘共和’，于是附会于‘周召共和’矣，译 Ethics 为‘伦理学’，于是附会于‘五伦’矣——所以即使造新名词，如其仍用野蛮之旧字，必不能得正确之知识，其故有二：（1）因国人脑筋，异常昏乱，最喜瞎七搭八，穿凿附会一阵子，以显其学贯中西。（2）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决不能代表 Lamark、Darwin 以来之新世界文明。”^④

同时钱玄同从教育普及的方面论述，认为：“文字者，不过一种记号；记号愈简单，愈统一，则使用之者愈便利。且学习简易文字之时间，必较学习艰深文字之时间能缩短；假如学习艰深文字，非十年不能毕业，而学习简易

① 钱玄同：《〈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新青年》3卷6号，1917年8月1日。

② 钱玄同：《〈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新青年》3卷6号，1917年8月1日。

③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④ 钱玄同答复陈独秀关于《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15日。